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招生规模结构探析

李慧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大夏大学多次迁校,从上海到江西牯岭,再到贵州贵阳,最后迁到赤水。期间,大夏大学的招生规模呈现出阶段性上升的特点;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招生最多,教育学院被撤后,法学院人数最多;迁黔之前的生源主要来自华东、华南,迁黔之后生源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男女学生比例不平衡,男生占大多数;招生渠道多元,以当地招收的新生为主。大夏大学通过严格培养管理、积极服务社会、开展自主办学、扩大招生宣传等举措,在战时的环境里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其经验值得当今高校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夏大学;招生规模;招生结构

【中图分类号】G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54(2017)03-103-008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校区受到战火影响,大夏大学多次迁校。在上海办学期间,大夏大学受战事影响从新校区迁回旧校区,战事结束后又迁回新校区。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大夏大学从上海迁到江西庐山牯岭,随后又迁到贵州省的贵阳,最后迁到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内迁过程中,大夏大学曾与复旦大学组建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牯岭开学,但随着南京的沦陷,学校再次被迫西迁,两校分开办学。考虑到部分学生未能随迁以及学生的求学需求,大夏大学在沪设分校,一切措施秉承黔校进行。本文探讨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的招生规模和招生结构,为当今高校招生改革提供借鉴。

一、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的办学历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夏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举行抗日宣传活动,并开展军事训练和看护

训练。1932年1月日军侵占上海,学校陷于战火被迫迁回胶州路旧校区,三月中旬迁回旧校区开学,七月返回中山路新校舍,大学部和中学部合并上课。“为谋学校附近居民增高知能起见”,1932年9月大夏大学成立大夏公社,“概不收取民众费用”^[1]。1933年秋,大夏大学增设师资训练班,训练中学师资和增进教育效率;增设土木工程系以培养建设工程技术人才。期间,学校不断完善校园建设,新建体育馆和实习工厂,扩大图书馆和各个研究室。1937年“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大夏大学因校舍被毁与复旦大学联合内迁。1937年11月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开学,同时学校在贵阳筹备第二联合大学。随着南京的沦陷,在牯岭复课仅一个月,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部分师生于12月开始内迁贵州,同时两校分开办学。

大夏大学是最早迁到贵州的大学,政府将贵阳讲武堂拨给大夏作为校舍,大夏师生被誉为“集体的

作者简介 李慧,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项目编号12JJD880017)的阶段性成果。

王阳明”^[2]。时任王伯群秘书的王守文在《抗战时期的大夏大学》一文中回忆到:大夏之所以迁来贵州,一是因贵州交通闭塞,文化比较落后,抗战前夕还没有一所大学,大夏应该迁到这种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

地方。二是因为王伯群是贵州人,有爱乡观念,又对家乡情况熟悉,容易得到当地的支持^[3]。当时共有八个大学及独立学院内迁至贵州,时称“黔中八大学”(见表1)。大夏大学在黔中八大学中,无论校舍、图书、仪器等设备,以及教授阵容方面而言,均远非其他各大学所可比^[4]。

表1 抗战时期内迁贵州高等学校统计

	原所在地	迁黔时间	迁黔地址
私立大夏大学	上海	1937.7	贵阳、赤水
乡政学院	济南	1938	惠水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河北唐山	1939.2	平越(今福泉)
国立湘雅医学院	湖南长沙	1938.10	贵阳
国立浙江大学	浙江杭州	1939	遵义、湄潭
国立中正医学院	江西南昌	1940	镇宁
私立之江大学	浙江杭州	1943	贵阳花溪
国立广西大学	广西桂林	1944.5	榕江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	广西桂林	1944	榕江、平越

资料来源: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383.

学校内迁贵阳,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五个学院和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并增设职业教育系、新闻学系、生物学系、建筑工程学系、商学系和国际贸易学系^[5]。各院系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历史社会系有吴泽霖、张少薇、罗荣宗、岑家梧等教授,中文系有谢六逸、李青崖、钟泰教授等教授。理学院的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试验器材与场所均具备。1938年秋,为满足社会需求,学校创办贵阳大夏中学。因学生增多,讲武堂显得狭小,1940年大夏大学在贵州省政府拨给的花溪公地和当地人士捐赠的2000余亩土地建设固定校址。1941年秋,南京政府教育部为创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下令大夏(黔校)停办教育学院和土木工程系,将教育学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土木工程系学生分发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社会系学生分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职业教育系学生分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所有学生一律借读,毕业仍由大夏大学颁发毕业证书。沪校仍设文、理、教、商、法五院,黔校的教育学系于1945年迁校赤水后恢复办学。1942年,大夏大学受贵州高等法院委托设法律专修科,受财政部盐务局委托开办盐务专修科,先后办了两期^[6]。

1944年11月,战火蔓延至贵阳,大夏大学开始迁

往赤水。学校得到赤水县各界人士的支持,以文昌宫大庙作为校本部,又有赤水中学、博文中学、赤水女中分别借给大夏大学一部分校舍。这样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便正式上课^[7]。“赤水各界士绅,竭诚合作,宾至如归,与大夏以物质精神多方之倾助,尤为永志难忘者也。”^[8]1945年秋抗战胜利,学校作复员准备。1946年春大夏将赤水的教具及校舍全部捐给当地各级学校,师生开始搬回上海,10月,贵州、上海两地学校合并^[9]。

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灵活调整办学,扩大招生,一方面不断完善校园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军事训练和救护训练。在贵州办学期间,大夏大学对贵州地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培养毕业生1576人,贵州中学校长绝大多数是大夏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各地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的负责人也多为该校社会教育系毕业生,理学院毕业生充实了各中学的数理化教师队伍,改变了贵州缺少理科教师的局面^[10]。

二、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的招生规模

抗战时期,受到战事影响,大夏大学招生人数下

降。其通过多地招生、增设新专业、多元招生、广聘名师等途径,学校的招生规模呈现上升态势。

(一) 学校总体招生规模

从1931年至1945年学生人数统计表可以发现

(见图1),大夏大学的学生数量呈现出阶段性上升的特点。学生数量明显下降出现在四个时间点,分别是1932年春、1937年秋、1942年春以及1945年春,各个节点之后学生人数呈现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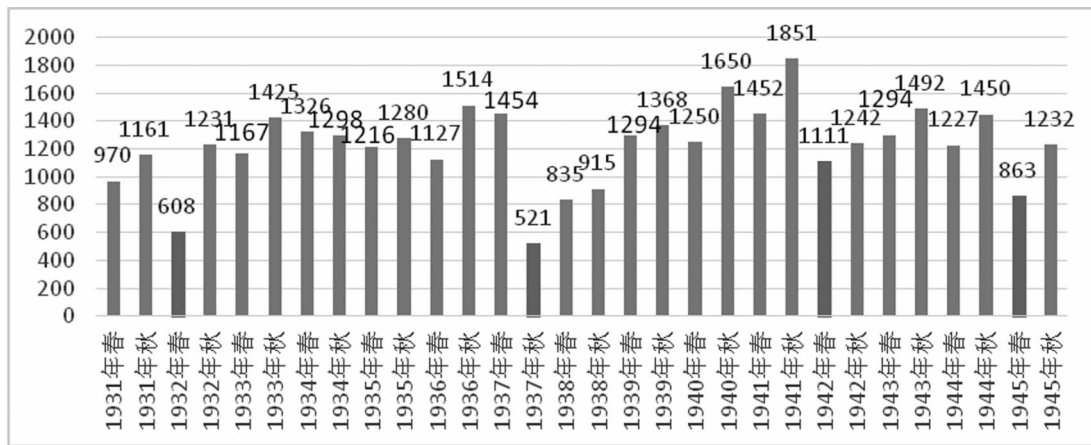


图1 1931-1945年大夏大学的学生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 姜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10.

1932年春季学生人数与前一学期相比下降约1/2,直接原因是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战火历时一个多月,导致校区被毁,学生入学被阻。此后,学生人数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基本维持在1200人以上。1937年日本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随后上海经历了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导致大夏大学秋季学生人数与前一学期相比剧降了2/3。随着学校内迁和多地招生等政策的调整,学生人数逐步增加,到1941年秋季,学生人数为1851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42年春季学生人数与前一学期相比,剧降了约2/5。可能原因在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法租界和香港相继被日军占领,上海分校的招生受

到严重影响,数量大幅下降。此外,同年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大夏大学(黔校)停办教育学系、社会系、职业教育系和土木工程系,院系的减少直接导致学生数量的锐减。大夏大学第29次校务会议决议通过1941年春季学期不招收一年级新生^[11],也导致了人数减少。随着局势的稳定、学校增设盐务专科等,学生人数再次缓慢上升。

1945年春季学期,学生人数出现第四次明显下降,下降了约2/3。原因在于1944年冬季贵阳受到战火影响,大夏大学仓促迁校赤水,部分学生未能随校迁徙和及时注册,导致注册人数减少。

总体而言,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的招生有了较大的进步。相比抗战前的招生规模(见图2)除了1937年秋季学期(521人),抗战期间大夏大学各学期的招生数量几乎都超过战前的平均招生数量(589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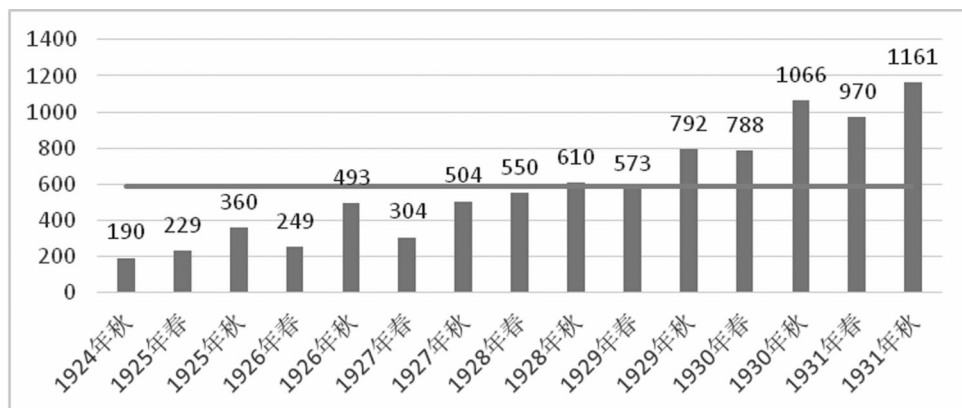


图2 1927-1931年大夏大学的学生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 姜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10.

(二) 黔校招生规模

从大夏大学本部(黔校)注册学生人数来看(见图3) 抗战期间学生人数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水平, 明显的学生人数下降出现在1937年秋季学期和1945年春季学期。可能原因是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 大夏大学临时决定内迁, 许多学生因战事未能及

时到校注册, 导致1937年秋季学期人数大减。此后, 随着部分学生赶到贵州报到, 注册学生人数有所上升。1944年冬, 大夏大学被迫再次搬迁赤水, 一定程度上造成1945年春季学生人数的下降。关于1941年院系停办的政策, 黔校学生人数似乎没有下降太多, 可能原因在于上海分校的许多师生因租界校区被日军占领而来到黔校, 补充了黔校的学生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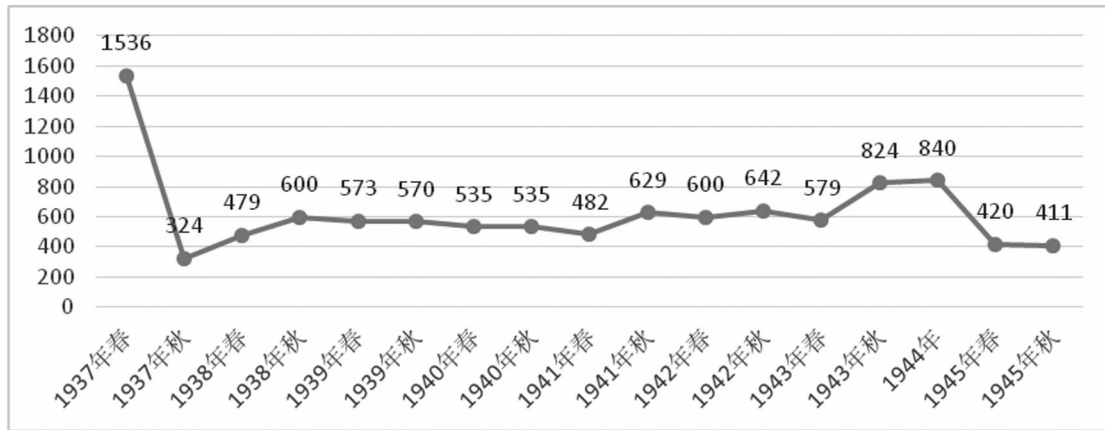


图3 1937年-1945年大夏大学(黔校)各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 ①贵阳大夏大学编辑. 大夏大学概况 [M]. 贵阳: 贵阳文通书局, 1941: 104.

②谢晓博. 迁黔大夏大学研究 [D]. 上海: 东华大学, 2012: 44.

三、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的招生结构

大夏大学最初设置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师范专科, 1941年院系调整后变为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四个学院和盐专科。受战事连连的影响, 加上院系的减少, 大夏大学的招生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下从学生院系分布、生源地域分布、性别结构和招生渠道等维度进行分析。

(一) 院系分布

从学生的院系分布表来看(见表2), 1941前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的招生最多, 其次是文学院、法学院, 再次是理学院和商学院。教育学院被撤后, 法学

院人数最多, 商学院、理学院招生比例增加。在抗战前, 教育学院是最大的学院, 抗战开始至1941年院系分割前教育学院招生也名列前茅, 其学生数量占学生总数的1/5以上。这得益于教育学院具有雄厚的师资, 也得益于校长对师范教育的重视。1941年教育学院被取消以后, 法学院的招生人数最多。1944年秋季注册的学生中, 法学院注册260人, 商学院注册158人, 文学院注册116人, 理学院注册46人。抗战后期, 商学院和理学院招生人数增加, 一方面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调整院系结构, 注重发展实用科学, 最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激增。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指出“大学农、工、理三科的毕业生, 出路较好, 而政治、经济、法律系的毕业生, 则特别感到就业的困难。因此这几年来, 青年升学的趋向也有所改变, 投考理、工、农三科的人比较考文、法的人来得多。”^[12]

表2 部分年份学生注册人数院系分布表(人)

时间	院科别	文学院	法学院	教育 学院	理学院	商学院	师专科	体专科	盐专科	预科	合计
		1929	秋季	251	67	132	64	59	214	—	—
1930	秋季	157	270	216/ 217	88/ 89	85	239	—	—	611	1581/ 1579
1932	秋季	142	324	264	115	155	231	—	—	—	1231
1936	秋季	171	317	338	280	219	171	23	—	—	1519
1937	春季	152	403	333	255	194	180	19	—	—	1536
1944	秋季	116	260	—	46	158	—	—	74	—	654

资料来源: 姜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9, 144, 220, 365, 384, 584.

(二) 生源地域分布

从生源地域分布来看, 迁黔前, 大夏大学生源主要来自华东和华南地区, 迁黔后, 西南地区的生源最多, 主要集中于华东和华南地区。西南、西北、东北、华北地区的学生生源很少。

表3 1934年春各学院及师专科学生学籍

省市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安徽	江西	广西	四川	湖南	湖北	云南	贵州
人数	398	188	178	114	96	74	65	61	54	27	19	16
省市	陕西	山东	上海	河南	南京	山西	辽宁	河北	甘肃	朝鲜	黑龙江	
人数	11	9	5	4	1	1	1	1	1	1	1	

资料来源: 姜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60.

从1938年秋季学生的省籍来看(见表4), 西南地区的生源最多; 其次是华东、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学面也反映了大夏大学为迁入地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数量的大幅增长, 一方面反映出西南地区学生求学展提供了机会。

表4 1938年秋季各院科学生各省籍统计表

省份	贵州	江苏	广东	安徽	湖南	四川	广西	江西	浙江	福建
人数	208	62	55	49	42	42	34	29	27	22
省份	湖北	云南	河北	上海	南京	辽宁	河南	山西	陕西	山东
人数	16	4	3	3	2	2	2	2	1	1

资料来源: 姜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35, 436.

大夏大学主要生源地的变化体现了上学距离对一点。1938年秋天注册的208名贵州学生中(见表5), 贵阳的学生最多(70人), 约占总数的1/3。

表5 1938年秋季208名贵州学生籍贯分布

籍贯	贵阳	遵议	安顺	靖镇	兴义	瓮安	平坝	黔西	大定	都匀	湄潭	织金	绥阳	贵定	独山	思南	水城	平越	郎岱
人数	70	26	14	10	10	7	7	6	5	4	4	4	3	3	3	2	2	2	2
籍贯	息烽	毕节	开阳	仁怀	习水	兴仁	镇宁	榕江	安南	麻江	安龙	八寨	铜仁	龙里	印江	关岭	赤水	普定	黄平
人数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资料来源: 姜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36.

(三) 学生性别分布

从学生的性别分布来看,大夏大学的男生占绝大多数,男女生比例不均衡。从1935年春季学生的性别分布来看(见表6),男生1029人,女生195人(约为男生数的1/5);1938年秋季注册学生中,男生454人,女生150人(约为男生数的1/3);1939年秋季注册学生中,男生429人,女生141人(约为男生数的1/3)。即使是在人数最多的贵州籍贯的学生中,1938年秋季注册的男生有154人,而注册的女生仅有54人,女生比例远小于男生。

表6 1935、1938、1939年秋季男生女生人数统计表

时间	男生	女生	合计
1935年春季	1029	195	1224
1938年秋季	454	150	604
1939年秋季	429	141	570

表7 1940年秋季黔校学生类型结构表(人)

学生类别		人数	
新生	本年秋季筑渝两地录取新生	75	105
	借读新生	19	
	以前录取本学期报告新生	7	
	附中直升	2	
	沪校在港录取来筑报道新生	2	
旧生	上学期在校肄业旧生	391	430
	复学旧生	30	
	沪校来黔肄业旧生	9	
总计		535	535

资料来源: 娄忞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91.

四、大夏大学办学的启示

作为一所知名私立大学,大夏大学在抗战期间的招生虽受到战时环境、政府政策的制约,但它充分发挥自己的办学自主权,利用贵州高校数量少的环境,通过灵活的招生举措,保障并扩大了学校的生源。大夏大学办学27年,培育了六千余毕业生,其中不乏著名人士,如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数学家胡和生、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水利工程专家陈赓仪、电子和计算机专家郭平欣^[14]等。大夏大学在抗战期间

资料来源: 娄忞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07, 435, 436.

(四) 招生渠道

从黔校招生渠道来看,学校招生渠道多元,以“当地录取新生”的渠道为主,其他渠道数量很少。从黔校学生类型结构表来看(见表7),以1940年秋季为例,大夏大学的新生来源有多种渠道,包括在筑渝(贵阳和重庆)两地录取的新生、借读新生、以前录取本学期间前来报道的新生、附中直升的新生、沪校在港录取来筑报道的新生五种类型。其中以筑渝两地录取的学生为大多数,占新生总数的3/4。旧生包括已肄业的旧生、复学的旧生和沪校来黔的旧生。多元录取渠道彰显大夏大学招生的灵活与自主,藉此学校有效地扩大了学生的数量。

的招生经验为当今高校办学和招考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严格培养,保障质量。高校应实行严格的考试管理制度,锻造质量金字招牌。考试是高校评定学生学习效果、检查教师教学水平重要环节,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体现。大夏大学以其考试制度严格而著称,欧元怀校长曾说,“训练教学,要绝对严格。成绩不良,期难造就的学生,每期应加以淘汰。”^[15]大夏大学考试众多,包括小考(一学期至少两次)、临时考、学期考试和会考(主要科目每学期会考一次)。毕业生徐珍提到“学校对考试要求很高,70分算及格。虽然

后来这个要求被取消,但是如《课程论》要求只有2/3的学生及格,剩余1/3要重修”^[16]。得益于严格的考试制度,大夏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毕业生。1934年中国银行公开招考5名高级行员,全国各大学1000多人争相报考,大夏大学3位毕业生被录取,分别排名第一、第三和第五,中国银行函谢大夏大学并邀请学校将每届毕业的优秀生介绍给中国银行^[17],足见社会对其教学质量的认可。当前教育部倡导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各高校应学习大夏大学严抓考试管理,开展多种形式考核,对日常教学质量层层把关,为社会培养合格的高质量毕业生。

第二,服务社会,扩大影响。大学不再是“象牙塔”,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大学须积极探索各种途径,增强与社会的联系,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在贵阳办学期间,大夏师生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扫盲、科普、演出,积极投入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如学校组织农村宣传队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救亡工作;开展“肃清贵阳文盲”的运动;与贵阳县政府合办华西农村改进区;创办贫民疾病治疗室两所,布种牛痘并诊疗贫民疾病;创办小本贷款一所,救济兼营小本商业的农民;设民众学校五所,成立民众阅览室^[18]。正因有这种责任和担当,大夏大学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增强社会服务功能、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刘延东强调,“高等学校要坚持协调发展,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要坚持特色发展”^[19]。高校需要密切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开展校企合作、开设民众讲堂、提供法律咨询和义诊等探索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路径,间接或直接服务社会。

第三,自主办学,扩大生源。自主办学是实现学校特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使得高校能够开设合适的专业,并通过合适的途径招收适性的学生,及时响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高校办学应合理使用自身的办学自主权,立足当地,服务社会。大夏大学根据自身条件和时势增设不同专业以满足当地对人才需求,如1942年受贵州高等法院委托设法律专修科,受财政部盐务局委托开办盐务专修科;举办暑期学校提供数十种课程,为学生补习,为中小学教员提供进修机会^[20];设置多种招生渠道,既有从各地招收的新生,还有附中直

升的新生和借读的新生,使不同类型的学生通过不同的入学渠道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系统多样的招生专业和灵活增设的招生项目为大夏大学扩大生源提供了可能性。高校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应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立足社会需求,将自身优势和外在条件进行最优组合,及时开设满足社会发展新需求的专业,强调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积极探索多种途径吸引学生报考。

第四,扩大宣传,服务考生。招考信息的受众多寡是高校招生成功的重要因素。高校应努力扩大招考信息的覆盖范围,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为考生提供及时的考试信息和便利的服务。为扩散招考信息和便利外地青年升学,大夏大学每学期在《申报》多次发布招考公告,并组织多次招生考试,如1940年春学校安排2月15日16日和3月11日12日两次招考^[21]。同时,学校设置多地招考,如1938年8月在贵州、重庆、湖南、南宁、香港等地设考场,加上后续到达的旧生,创造了1938年秋季学期600人注册的高峰^[22]。在交通不便的时代,考试便利是影响考生投考的重要因素,大夏大学增加招考次数和考试地点为考生提供便利,有效地扩大了生源。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可获得性取代交通便利成为影响报考的重要因素。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高校需要创新招生宣传方式,扩大招生宣讲覆盖面,综合利用校园开放日、各地招生宣讲会 and 新媒体传播等方式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和离学校较远的省份的知名度。此外,以考生为本,高校应多渠道提供相关的考试信息和咨询服务,可在中西部等交通不便省市设置代理考点或提供交通补助等,以方便考生获取考试信息和参加考试。

第五,重视平等,保障弱势群体。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其公平性备受社会关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促进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23]。大夏大学所在的时代导致了其学生的男女比例差异较大,女性学生数量过少。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当前高校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但受制于社会历史、经济等多方面原因,高等教育领域仍存在其他不公平现象。为了保障教育机会的公平,国家和高校应该倾斜并照顾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如坚持实施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学

生的三大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为弱势群体考试提供便利,也是促进公平的重要方面。2015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不仅取消考试费用,贫困考生还可以向学校申请考试费用的资助。同时,2015年清华大学在全国开设30个自主招生初试考点,方便了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考生就近选择考点参加考试。探索多样的服务方式,提高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是高校和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之,抗战时期大夏大学通过严格培养管理、积极服务社会、开展自主办学、扩大招生宣传等举措,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前来求学,培养了众多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办学的历史经验,值得当前高校办学和招生改革吸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11][13][18][20][21] 娄岙菲. 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21, 495, 417, 417, 406, 440.

[2][8][16] 陈明章. 私立大夏大学[M]. 台北: 南京出版社, 1982: 26, 6, 238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M]. 贵州: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 149.

[4][5][6][7][9][14] 张德龙. 大夏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M]. 上海: 大夏大学校友会, 1994: 68, 50, 51, 51, 51, 52.

[10] 梁茂林. 回眸与思考: 贵州学校教育初探[M]. 贵州: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 129.

[12] 金以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1895 - 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203.

[15] 李富春. 大夏之魂欧元杯[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27.

[17] 惠世如.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 142.

[19] 刘延东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EB/OL]. http://www.gov.cn/lidhd/2012-08/21/content_2207920.htm, 2017, 2(13).

[22] 谢晓博. 迁黔大夏大学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12: 47.

[23] 打通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05/content_2630205.htm, 2017, 2(13).

Research on Students Enrollment of 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Li Hui

Xai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a famous 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 was greatly compelled to move from Shanghai to Lushan, then to Guiyang, finally to Chishui. The student enrollments showed an upward tendency with fluctuation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sparity among school - wise enrollments,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came from Huadong and Huanan area before 1937 and Xinan area after 1937, unbalanced gender ratio, and overly emphasis on recruiting students from counties closer to university. Though affected by the war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e outstanding profile and flexible enrollment policies of Great China University benefited through increasing student enrollments.

Key words: Anti - Japanese War, Great China University, Students Enrollment, Enrollment Structure

(责任编辑: 葛鸿贵)